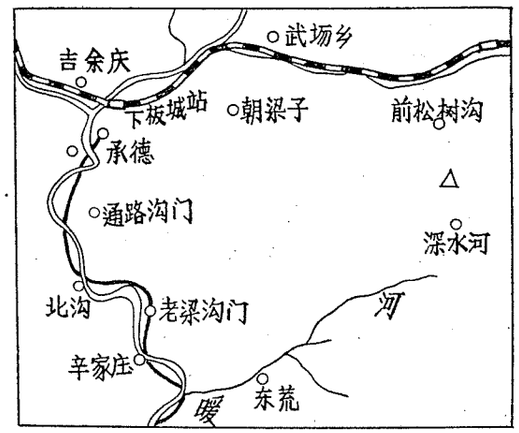
# 承德发现的契丹符牌

郑绍宗

河北省承德县八家公社深水河村的社员，1972年冬在该村水泉沟附近的老阳坡打猎，无意中发现了金银符牌各一面。次年6月，省博物馆、省文管处会同当地有关部门，对符牌发现的场所进行了调查。

深水河村位于承德县南的暖儿河上（图一），河水东西流，在河西约12公里处注入滦河。深水河村西约2公里有一水泉沟，沟长约7.5公里，是一条由西南走向东北的纵深峡谷。沟的北端有一分岔名塌木沟，塌木沟东北有高山呈圈椅形，山脚作斜坡状，山腰以上悬崖陡绝，即老阳坡。老阳坡东有一鞍形凹地，凹地东南系绝壁石磴，壁峭涧深，俯视涧底，深数十米，形势险峻。金银牌便是在老阳坡大磴子顶峰靠南的峭壁中发现的（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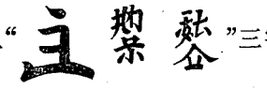

图一　金、银牌出土地点示意图

发现时金牌在上，银牌在下，两者相距约1.7米，平置于石磴缝隙之间的台面上，牌首东向。台面甚小，约可容一人。金银牌近处均有夹杂植物腐质的土壤，估计原来金银牌都用木盒盛装，经过千年风吹雨淋，掩埋的浮土冲刷既尽，木盒逐渐腐朽，因此符牌（尤其是金牌）外露闪光，引起发现者的注意。

除上述金银两牌以外，这里尚未发现其它遗迹。

金牌牌面为长方形，四角抹圆，体如薄板，光亮耀目。重475克，含金纯度达98%。长21、宽6.2、厚0.3厘米。上端有穿孔，内径1.0、外径2.5、孔深1.4厘米。孔的圆周突起如箍，内壁有磨痕。穿孔下刻双钩阴文“”三字（图三）。

银碑的形状和文字与金牌全同（图三）。重383克，长20.9、宽6.1、厚0.3厘米。穿孔内径1.0、外径2.2、深1.4厘米。内壁亦有磨痕。体积、穿孔均略小于金牌。牌面有污锈，呈亮黑色。文字为双勾阴刻，阴刻部分鎏金。

金银牌上“”三字，前一字是单文，后两字是由三个单文组合而成的复字，目前还不能确切解读。但是根据这种文字的构造方式，可以看出是与辽陵哀册



类型的文字（即契丹小字）相当，而与锦西西孤山出土的契丹字（即契丹大字）不同①。虽然在现存契丹小字中并未找出与此三字完全相同的文字，但是某些单文如“”、“”，则分别见于辽道宗哀册和宣懿皇后哀册。而且第一个字“”似即辽陵哀册“（皇帝）”二字的前一字，哀册文中还有“”字，可能就是“”的草书，与汉字“主”字相当。因此我们初步认为，金银牌上的文字应是契丹小字。



图二　承德县八家公社深水河村，塌木沟老阳坡，有↓处为金、银牌发现地点

据《辽史·仪卫志》卷三“符契门”记载：“银牌二百面，长尺，刻以国字，文曰‘宜速’，又曰‘敕走马牌’……”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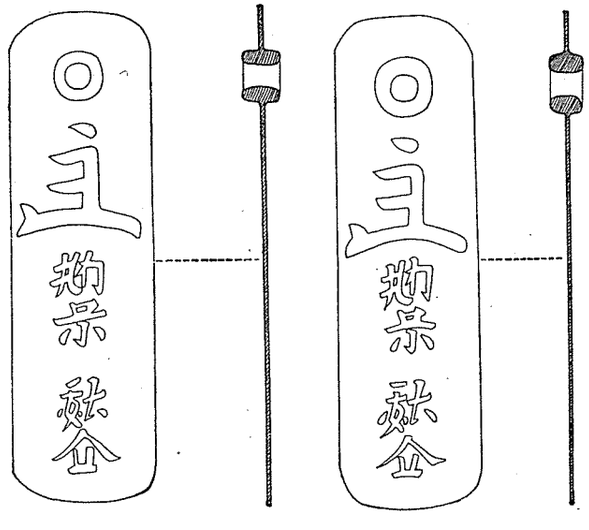
又据王易《燕北录》：“（契丹）银牌有十三道，上是番书‘朕’字，用金镀银成，见在内侍左承宣宋璘收掌。……长牌七十二道，上是番书‘敕走马’字，用金镀银成，见在南内司收掌。……又木刻子（？）牌，约有一十二道，上是番书‘急’字，左面刻作七刻，取其本国已历七世也。右面刻作一刻，旁是番书‘’字。其字只是用金镀银叶掐成，长一尺二寸……”③。

此外如《松漠纪闻》等书，都有关于辽代金银牌和银牌天使的记载，兹不赘举。

《辽史》和《燕北录》所说的几种符牌，其刻“走马”二字的一种已见于若干年前在旧热河某地发现的所谓“成吉思汗圣旨牌”④。此牌正面用汉字刻“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面刻写契丹文“戈用”二字，正是陶宗仪的《书史会要》所录的“走马”⑤。

因此我们进一步推断：“”三字就是契丹小字“敕宜速”。其“”字既相当于辽陵哀册的“皇”字，自可解作“敕”，后两字则为“宜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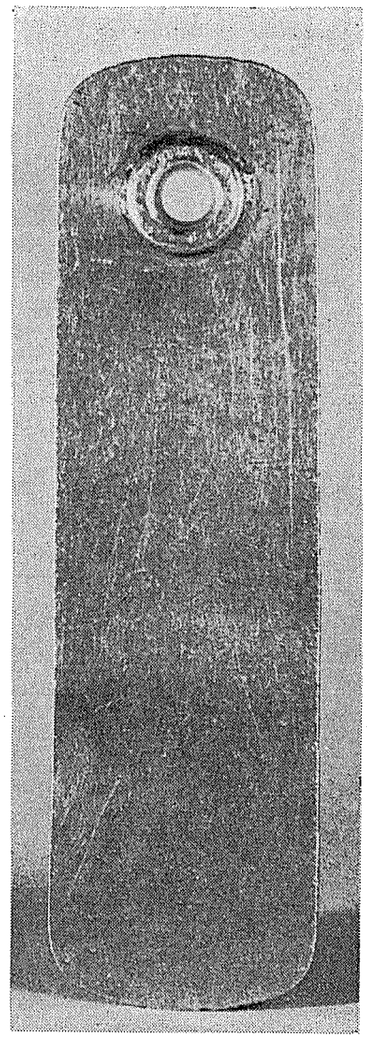
必须指出：宋人周煇和范成大也有关于金代金银牌的记述⑥，他们说金代的银牌“上有御押，其状如”



图三　金牌　　银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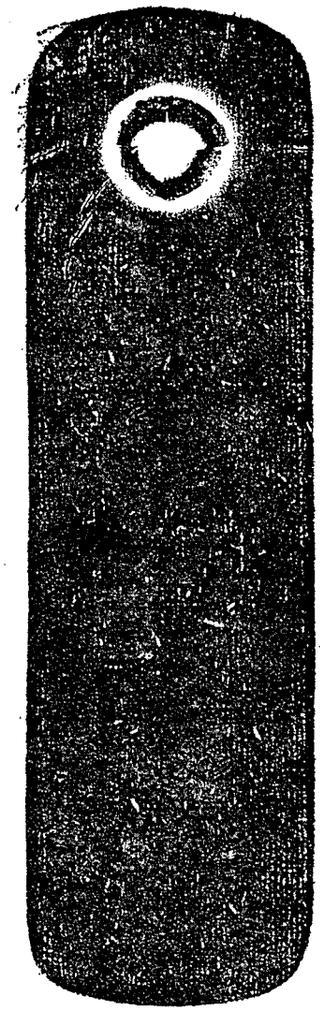
金牌正面



金牌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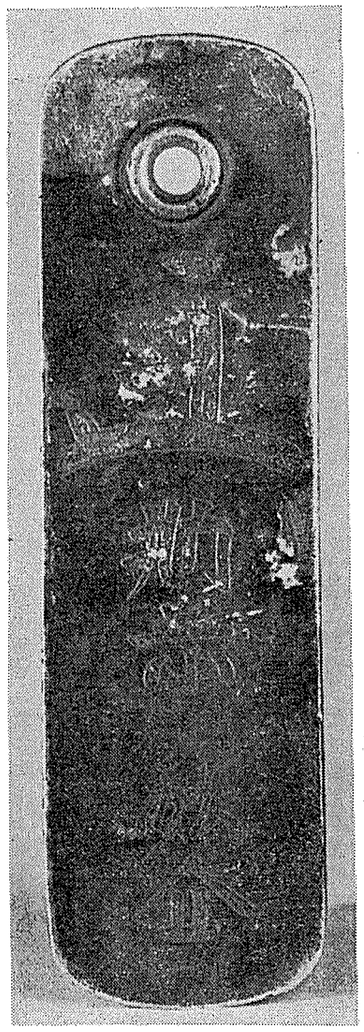


金牌正面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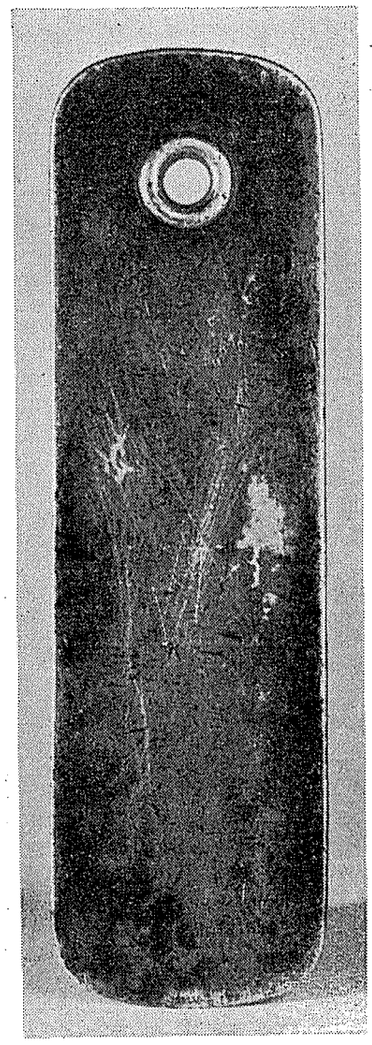


金牌背面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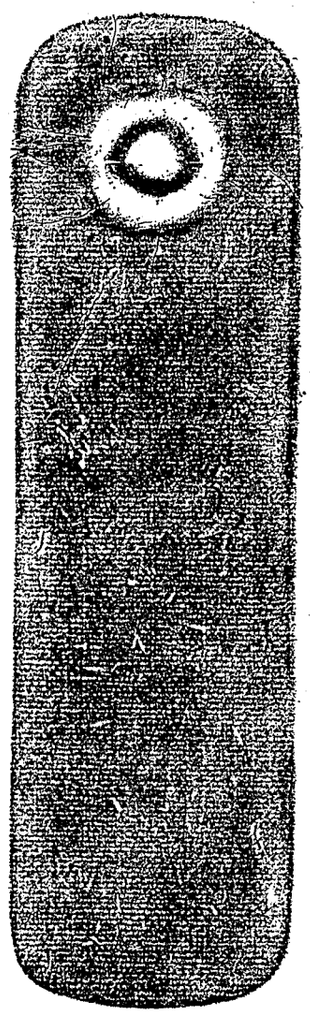
银牌正面



银牌背面



银牌正面拓片



银牌背面拓片

”字，“上有……及阿骨打花押”。我们认为承德出土的金银牌上的“”，与辽陵哀册文中的“”(皇帝)更近于“主”字，解作辽国皇帝御押也无不可；而且周烨和范成大所说的银牌，蕃书乃是“急速走递”、“准敕急递”四字，把承德出土的金银牌后两个字解作上述四字更是牵强，何况它不是现存女真字类型的文字⑦，所以不能根据周烨和范成大的记载定其为金代符牌。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把承德出土的金银牌三字译作“敕宜速”，可能是比较符合《辽史》和《燕北录》记载的，是否确当，有待今后进一步调查研究。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符牌制度正是体现皇权至高无上的一个方面。尤其刻有所谓“御押”并注明“宜速”、“走马”字样的金银牌更是这样。符牌用于行军作战、调发军马，也用于调取和掌握地方的兵、刑、钱、谷等事。所谓“国有重事，皇帝以牌亲授使者……所至如天子亲临，须索更易，无敢违者。使回，皇帝亲受之，手封牌印郎君收掌”⑧，表明这是封建统治阶级用于维护其封建统治、剥削和压榨劳动人民的一种工具。金银牌的授与对象，自然就是当时的重要军政人物或为其服役者。

因此我们认为，承德发现的金银牌的持有者，可能是在辽代身居要职的军政官员；而且牌面有经过碰撞的凹形小坑和锈蚀，穿孔内壁有磨痕，表明在秘藏以前是经过佩带的。

但是两牌分置于较近的距离，必是同时函封、同时秘藏。为什么藏到这个人迹罕至的老阳坡峭壁里面？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秘藏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探讨金银牌出土地点的重要性着手。

金银牌的出土地——老阳坡、暖儿河，虽不见于史传记载，但是暖儿河附近的老牛河，就是《水经注》的五渡水⑨，老阳坡附近的鸡冠山，元代称为五指山；观音山则称敌楼山⑩。八家公社和深水河村适当辽代中京与南京的交通孔道。辽末在中京大定府的泽州、北安州地区曾有过较大的战役。辽泽州，金改惠州，均治郭山县，元废县称郭山站，遗址在今河北省平泉县南察汉城。辽北安州，金元改兴州。不过辽的北安州治利民县，遗址在今河北省丰宁县博洛河屯；而金元的兴州，治兴化县，遗址在今河北省承德县喀喇河屯。泽州、北安州的战役，特别是北安州的战役⑪，必然会波及这里。我们设想这两块金银牌，可能就是当年辽战败撤守时有意暂时秘藏，以待日后归来再取，但是后来秘藏者或战殁、或远遁，或因其它原因，终未能取回，搁置在这里，将近一千年之久，直到被深水河村的社员发现为止。因此我们初步断定，金银牌的时代下限在辽天祚皇帝保大二年（1122年）前后。

① 《辽陵哀册》文、《郎君行记》、《义县清河门辽契丹文墓志》、《梓木林子契丹国书墓志铭》等为契丹小字，其字多单文叠合而成；《故太师铭石记》、《萧孝忠墓志》、《辽太祖陵刻石》等为契丹大字，其字皆单文直书。参阅金毓黻：《辽陵石刻集录》下册；李文信：《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1954年《考古学报》第八册)；郑绍宗：《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1973年《考古》第三期)；王静如：《兴隆出土的金代契丹文墓志铭解》(1973年《考古》第三期)；李文信：《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1942年抽印本)；阎万章：《辽宁锦西西孤山出土辽墓墓志》(1956年《考古通讯》第二期)；洲杰：《内蒙古昭盟辽太祖陵调查散记》(1966年《考古》第五期)。

② 《辽史》此段文字出自张舜民的《使辽录》(见《契丹国志》卷二五)。

③ 涵芬楼重排明抄本《说郛》卷三八，《辽史拾遗》卷一五。我们对原文已略作校正。

④ 岛田贞彦：《考古学上所见的热河》图版51、52。

⑤ 《书史会要》卷八“走”字误作“支”，“马”字误作“闲”。

⑥ 周烨《北辕录》：(金人接伴使臣)“各带银牌，牌样如方响，上有蕃书‘急速走递’四字，上有御

(下转第94页)



# 广东珠海、汕头出土的元、明瓷器

广东省博物馆　曾广亿

1969年4月珠海县南水公社渔业大队民兵，在蚊洲岛沙滩冲积层的一个凹槽中发现几件元代瓷碗半露地面，当即进行清理，发掘出青、灰、黄釉碗、碟212件。6月，驻珠海县人民解放军某部，将其中碗、碟7件送交广东省博物馆。7月，省博物馆派人会同渔业大队民兵和公安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和探掘，将出土的全部瓷器带回博物馆保存。1971年初，汕头市阀门厂工人，在市郊金沙农机厂前面的沙丘中挖运细沙时，又在沙层中发掘出64件明代青花瓷器，有碗、碟、杯、罐、器盖五种。广东省博物馆闻讯后又派人会同汕头市文化局同志到现场进行调查，将全部出土瓷器送交省博物馆保存。现将上述两地的调查、探掘情况和出土瓷器分别叙述如下。

## 一

珠海蚊洲岛位于南水公社东南约16公里，是一个凹字形的低矮岛屿，面积约200×350米，东是圆墩岛，西是高兰岛，北与青洲岛相望，南面临海。该岛有不少大花岗岩石半露地面，野草丛生，无人居住。蚊洲岛潮水退后南北均有坡度不大的小沙滩，瓷器埋藏在北面的沙滩冲积层中。我们在瓷器出土地点开挖了一个2×2米的探方，深1.2米。这一带的沙质可分四层：第一层是黄褐色细沙层，厚30厘米，是近期内冲积而成的，未发现任何文化遗物。第二层是灰褐色淤积泥沙层，即瓷器出土时的表土层，亦未见任何文化遗物，厚8至10厘米。第三层是淡黄色细沙层，厚50厘米，全部瓷器就是在这层发掘出的；出土时碗、碟均分类层叠侧放，排列六行；此外还在沙层中发现16件青、灰釉划花、印花瓷碗残片，黄釉素面瓷碟残片和一些包装瓷器已腐朽的草木灰痕。第四层是深黄色细沙层。未发现任何文化遗物。

瓷器的釉色有青、黄、灰三种。青釉有青中微带灰色的，也有青中微带黄色的，釉色表面光泽很强，也有个别不强或不闪光的。黄釉一般都是黄中微带青色，也有黄中微带灰色或作砖黄色，釉药较粗，光泽仅次于青釉，但也有个别较强的。灰釉有灰中微带青色或灰褐色，釉药有三种：一种釉薄，光泽很强；一种釉厚，光泽甚弱；一种釉粗，似陶衣，无光，手摸即起铁锈色粉状，施釉厚薄不均，有泪痕，间有个别器物内底釉色强似玻璃，但器壁内外釉药无光，优劣相掺，颇不调和。上述三种釉色以青釉居多，灰釉次之，黄釉最少。

瓷器的胎质大致可分灰、灰白、砖红、淡黄四种。灰胎、灰白胎胎质坚硬，主要施青釉、黄釉二种，施灰釉的极少。砖红、淡黄胎，胎质不纯，含少量沙粒，火候不高，质松弛，吸水性大，主要施灰釉，施青釉、黄釉的极少。

瓷器有纹饰的占总数85%弱，素面无纹的占总数15%强。纹饰都是在器胚未干时在

厘米以下的淡黄色细砂层中。这细砂层在海水退潮时高出海面约1米，涨潮时则在海面50厘米以下的水中。埋藏瓷器的地点，未发现其它遗物。汕头金砂出土的瓷器亦集中埋藏在海边深约2米的沙丘冲积层中，亦未发现其它遗存，因此可知这两个地点，不属古代人类居住的文化遗址，不属古代墓葬，更不属古代烧制瓷器的窑址。

元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除泉州外，广州居重要地位，摩洛哥人阿拔杜拉在游记中写道："共在河（海）上行二十七天……直达秦克兰，即兴阿兴（广东）也。此处亦如剌桐，瓷器甚盛。……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市所不及。其间最大者莫过于陶器场，由此，商人转运瓷器至中国各省及印度、也门。"又说："中国人将瓷器转运出口至印度诸国，以达吾故乡摩洛哥。此种瓷器真世界最佳者也。"④珠海蚊洲岛是广州海路至东南亚、印度、也门和摩洛哥等必经之地。到了明代，我国的外销瓷器，比元代又有更大量的增加，特别是"自1498年（明弘治十年）后，西欧一些国家，到东方来寻找'黄金'。……贩运瓷器也以这个时期为最盛。从前瓷器输出最远不过波斯湾、地中海，现在居然绕过大西洋，遍行全欧洲。"⑤可见当日外销瓷器数量之大。当时输出的瓷器虽以江西景德镇和浙江龙泉窑等名窑瓷器为主，但其它地区民窑瓷器数量也不少。汕头是古代对外海运交通港口，也是浙江、福建等省海运至阿拉伯、印度、波斯湾及欧洲等必经之地。因此这两批瓷器无疑是当时出口的一宗商品，因货船沉没而被海水冲击至沙层中所遗留下来的。这些出土物说明了当时我国海外交通的盛况。

① 陕西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耀州窑》，科学出版社出版，1965年。
② 程应麟　彭适凡：《江西抚州发现元代合葬墓》，《考古》1964年7期。
③ 曾广亿：《广东博罗、揭阳、澄海古瓷窑调查》，《文物》1965年2期。
④ 转引自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中国的瓷器》8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3年。
⑤ 同上书，85页。

（上接第84页）

押，其状如'主'字。虏法出使皆带牌，有金、银、木之别。"范成大《揽辔录》：（接伴使副）"皆带银牌。虏法出使者必带牌，有金、银、木之别，上有女真书'准敕急递'字及阿骨打花押。"

⑦ 金光平、金启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1964年《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第一期）；葛鲁贝：《女真语言文字考》（1896年）；安马弥一郎：《女真文金石志稿》（1943年）。另有《侍御史奥屯良弼诗》，若干年前发现于山东蓬莱，乃女真字草书。上述女真字均系单文直书，非堆叠成文，可能是完颜希尹根据契丹大字改制的女真大字，因为两者的形体和构造比较接近。史载女真文字亦有大小两种，女真小字迄未发现。承德出土的金银牌是否可能即女真小字，因可资比较的资料较少，还不能肯定。参阅金光平：《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1962年《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二期）。

⑧ 《辽史·仪卫志》卷三《符契》门，又见《燕北录》（《说郛》卷三八）。

⑨ 《热河志》卷六九，《水志》一（《辽海丛书》本第一六页上）。

⑩ 同上书，卷六五，《山志》一（《辽海丛书》本第三页上）。

⑪ 见《辽史》卷二九《天祚皇帝纪》；《金史》卷二四《宗翰传》等。




# WEN WU

(Cultural Relics)

No. 10, 1974


**Main Contents**


The Provincial Museum of Kwangtung,
Reconnaissance of the Cultural Relics in Hsisha Islands, Kwangtung Province …… (1)

The Group for Re-editing Han Silk Manuscripts from Ma-wang-tui,
Transcription of the Four Lost Ancient Essay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lk Manuscripts (Text B) of *Laotzu* Found in the Han Tomb No. 3 at Ma-wang-tui, Changsha …… (30)

Cheng Wu,
The Thinking of Yellow Emperor and Laotzŭ of the Early Han Period and the Political Line of the Legalist School…… (43)

Hung Sheng,
Ch'in Shih Huang's Historical Merits as Seen From the Dredge of the Ling Canal at Hsing-an County, Kwanghsi Province…… (53)

The Museum of Sink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of Various Nationalities in Sinkiang Criticizing Lin Piao's Worship Confucius and Soviet Revisionists' Vain Attempt to Spoil the Unification of Our Country…… (68)

Chêng Shao-tsung,
Notes on the Khitan Commander's Tallies Found at Cheng-teh, Hopei Province …… (82)

The Provincial Museum of Kwangtung,
Some Yüan and Ming Porcelains Uearthed at Chu-hai and Swatow, Kwangtung Province …… (87)